

# 林纾研究的新突破及其启示

王祖华 (四川外国语大学, 重庆 400031)

**[摘要]** 长期以来,在没有核查翻译底本的基础上研究者对林译作品的“缺陷”做出了一些基本一致的判断。樽本照雄在《林纾冤案事件簿》中通过追查林译底本与细致的文本对照后发现,林译既没有随意更改原作体裁,也没有大幅删改底本。他的研究在观念认识、史料挖掘和文本对照法等方面对林译研究有重要突破,同时启示我们,在进行翻译史研究时既要充分重视史料的考证,又要对一些广为接受的观点保持高度怀疑。

**[关键词]** 翻译史;底本;《林纾冤案事件簿》;林纾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358(2021)04-0080-05

## 1. 引言

《林纾冤案事件簿》(以下简称“《事件簿》”)是樽本照雄的一部学术论文集,共收林纾和林译研究文章9篇,大部分论文之前在日本已公开发表。此次集结出版时,樽本照雄为每篇文章撰写了按语,部分文章增加了新内容或新文献。他为论文集撰写的前言、凡例和后记,有利于读者更好认识他的研究意图、研究思路和核心概念。此外,“林译斯宾塞冤案”“林译塞万提斯冤案”和“林译小说冤案的原点——关于郑振铎‘林琴南先生’”这三篇论文以前从未公开发表过。2018年7月,商务印书馆推出该书的中译本,让更多中国研究者有了深入了解相关研究的机会。樽本照雄(2018:462)在《后记》中称,林纾在翻译的小说中为研究界安置了一颗“炸弹”,是他在近百年后引爆了这颗“炸弹”。显然,他希望通过使用这些极具冲击力的词语,引起中国同行的注意。两年多过去了,除了报刊上寥寥几篇讨论文章外,我国学界对这本书的反应似乎有些冷淡。

在笔者看来,《事件簿》堪称林纾和林译研究的一颗“深水炸弹”。它在许多方面颠覆了百年来国内外对林纾和林译的普遍认知。樽本照雄对此前林纾与林译研究的批评、对翻译底本意识的强调,都将成为我们重新认识林纾和林译的起点。他在9篇论文中检视了林纾和林译研究的几个重要方面:第一篇文章“漫骂林纾的快乐”主要讨论林纾如何由外国文学翻译旗手变成被批判的对象,这篇长文为后

面几篇文章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时代语境和批评视野;第二至第五篇是林译研究个案,这四篇文章在笔者看来是整个论文集最精彩、最具启发性的部分;第六至第八篇讨论影响林纾和林译评价走向的两个重要人物:郑振铎和鲁迅;最后一篇文章从观念认识的角度反思学界对林译小说的评价。本文不打算详细介绍该书内容,拟重点探讨其中几篇专门研究林译的文章,以揭示《事件簿》对林译研究的新突破及其对我国翻译史研究的启示。

## 2. 《事件簿》对林译研究的新突破

《事件簿》在多个方面有重要突破,首先是观点、认识的突破。长期以来,研究者对林译的缺陷形成了一些稳固的看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是选材不当,翻译了太多二三流作品;二是随意改变源文体裁<sup>①</sup>,如认为林译将莎士比亚戏剧改写成小说;三是大幅删改源文。这三点可谓林译缺陷论的三根支柱。经过一代代研究者的重复,似乎已成为“定论”。2016年,陆建德撰文批驳了国内研究者长期以来对林译通俗作品的贬抑,认为“林译通俗小说的价值不亚于‘名著’”(陆建德,2016:135-142),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强烈共鸣(谢天振,2018:4-7;王祖华,2019:23-28)。陆建德的研究推倒了林译缺陷论的第一根支柱,是近年国内林译研究在观念上的一大突破。

樽本照雄的研究则动摇了林译缺陷论的第二、第三根支柱。他通过长年累月的版本搜集和细致的

**[基金项目]** 本文为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近代翻译与中国传统婚姻观的解体(1840-1919)”(编号:20SKGH134)及四川外国语大学科研项目(编号:sisu2019010)部分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 2019-11-20

**[作者简介]** 王祖华,四川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翻译史与翻译教学。

文本对照,从大量版本中排查出林译莎士比亚、易卜生、斯宾塞和塞万提斯的底本,以确凿证据推翻了林译改变源文体裁、大幅删改源文的论断。“林译莎士比亚冤案”一文对照了11个英文版本,最后确定林译莎士比亚历史剧的底本是奎勒·库奇已经小说化的书籍《莎士比亚历史故事集》,推翻了林译将戏剧小说化的观点。(樽本照雄,2018:203-281)“林译易卜生冤案”比勘了易卜生《群鬼》的各种英译本与林译《梅孽》,发现林译使用的底本并不是易卜生的戏剧本身,而是已经小说化的德尔版《易卜生的“群鬼”故事》,否定了郑振铎等人认为林译将易卜生戏剧改成小说的观点。(樽本照雄,2018:287-307)“林译斯宾塞冤案”考索出林译《荒唐言》一文的底本是已经小说化的、学生版的 *Tales from Spenser, Chosen from the Faerie Queen*,否定了郭延礼等学者认为林译将斯宾塞的长篇寓言诗改为散文故事体的说法。(樽本照雄,2018:308-321)“林译塞万提斯冤案”对照了9个《堂·吉珂德》英译本和1个日译本,认为林译《魔侠传》的底本很可能是莫妥英译本。(樽本照雄,2018:322-366)进一步的文本对照表明,林译并没有对源文随意进行大幅删改。

《事件簿》在史料上也有很大突破。史料是翻译史研究的基础,但“史料的停止已成了翻译史研究新进展的一个障碍”(王建开,2007:56)。梳理五四以来的林译研究,我们发现大部分研究偏重现有史料的阐释,具有突破性的史料挖掘并不多。比较严谨且重要的史料挖掘,大概有五次。第一次是1935年,寒光在《林琴南》中列出171种林译作品的书名,比较详细地注出了大部分译作的原著书名、同译者和出版者,并辑录了学界对林译的评论,填补了当时研究的空白。第二次是1960年,阿英在《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收录了林译小说的序文、识语、小引、时人对林译的评论和诗文题咏等数十篇。第三次是1981年,马泰来在《林纾翻译作品全目》一文中考订出林译大部分作品所据原著的书名,至今仍是林译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第四次突破发生在1982年,薛绥之和张俊才在《林纾研究资料》中收录了林纾发表在《平报》上的56篇译作篇目。第五次是1994年,李家骥等根据林纾手稿整理出版了《林纾翻译小说未刊九种》,成为研究林译手稿的珍贵资料。樽本照雄本次发现的四个林译底本,堪称林译研究史上又一次重大的史料突破。这一突破不在数量和规模上,而在其发现的问题及底本发掘可能产生的颠覆性力量上。这几个底本的

发掘不仅动摇了林译缺陷论的两大支柱,还将促使更多林译底本的发现,引发许多延伸性思考:如果林译莎士比亚、易卜生、斯宾塞和塞万提斯存在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底本,其他林译本会不会也有类似情况?如果那些广为接受的观点并不符合事实,我们之前对林译的认识到底有多少站得住脚?清末民初其他译者的译作会不会也存在我们还不知道的底本?我们对清末民初翻译的认识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信的?可见,这四个底本的发现意义非同寻常,不仅会彻底改写文学史、翻译史和林译研究的相关论断,而且也会根本动摇我们对现有林译研究的结论,甚至是清末民初翻译研究结论的信心,促使我们进一步扩大质疑和反思的范围。

樽本照雄的研究还突破了“原文-译文”对照法的“原文”误区。林译到底依据什么底本翻译的?以前很少有人深究或者说大多数研究者没有意识到还有底本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习惯的“原文-译文”对照法存在盲区。我国学者在研究清末民初的翻译时,最常见的文本对照方式有两种:一是将现代译本与清末民初译本对照,一是将所谓的外国“原文”与清末民初译本对照。前一种做法显然存在很大问题,渐渐已被严谨的学者抛弃,但后一种做法仍很普遍。樽本照雄的研究表明,后一种做法也存在很大问题,而且具有更大的迷惑性。针对“原文-译文”对照法存在的问题,他提出“原作”“小说化”“改作”“底本”等概念,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提出的“原作”与“底本”这两个概念。“底本”原是校勘学上的一个术语,指的是“校勘一部古籍时所采用的工作本”(王瑞来,2019:3)。在校勘学上,“选择底本是校勘古籍最重要的一步”(同上)。翻译研究的文本对照也类似于校勘,确定底本应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樽本照雄的研究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特别重视底本考索这个环节。他没有明确界定“底本”的含义,但从他的论述看,“原作”是作者用创作语言出版的完整作品,“底本”是译者翻译时使用的特定文本;“原作”可能有多个衍生版本,“底本”则往往只有一个。一部作品问世后,因再版、重印等原因会产生不同版本;为满足不同需求,还可能被改编、改写或删节,从而产生不同的改编本、删节本、缩写本等等。即使是再版、重印,书籍的装帧、序跋等也往往会有不同程度的变化。而大多数译者在翻译时,只会使用某一个版本作为翻译底本或主要底本。如果拿一个并非译者翻译时使用的底本(这样的文

本可称为“伪源文”)考察译文,所得出的结论将很难与事实相符。樽本照雄意识到“原作”可能存在不同的物质形态,而“底本”却具有唯一性。他的研究表明,林译莎士比亚作品、《梅孽》《荒唐言》和《魔侠传》的底本均不是原作,而是已经小说化的改编本、小说化的英译本、小说化的学生版本或调整了排版的英译本。认识到“原文”与“底本”的概念性差异,是他能够突破前人研究的重要原因。

### 3. 《事件簿》对我国当前翻译史研究的启示

尽管樽本照雄将这本文集命名为《林纾冤案事件簿》(日语原名为《林纾冤罪事件簿》),其学术价值并不仅仅在为林纾平反。樽本照雄的研究暴露了林译研究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些深层问题。他在论文中所做的尖锐批评、详细描述的底本追查与文本比勘过程、以及极力纠正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误区,对我国当前的翻译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和启示意义。

首要的一个启示,就是翻译史研究应高度重视文献的考证和研究材料的适用性。翻译史研究属于历史研究的一种特殊类型。历史研究素有考证与著述之分。史学家大都同意史料考证对于撰述的重要性。历史学家何炳松指出,“无考证而言著述,必流为无根之谈”,“著述之道,根考索而来,非凭虚作赋”(转引自王尔敏,2018:240)。王尔敏(2018:239)亦认为,考证辨异是历史著作的预备工作。纵观百年来的林译研究,存在明显的重著述、轻考证倾向。林译研究著述不计其数,进行严谨史料考证的却并不多。林译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源文?按理说只有在确定了林译的底本并通过大量、缜密的文本比勘后才能得出结论。但是早期的研究者(如郑振铎、寒光等)基本没有进行细致的文本对照。新时期后,通过文本对照考察林译的渐渐多了,但拿来和林译对照的文本却往往很成问题。有的研究者随便拿一个现代译本与林译对照,如拿1958年董秋斯翻译的《大卫·科波菲尔》与1908年林译《块肉余生述》对照。(韩洪举,2005:126)有的则随便拿一个与原作同名的外文版本与林译对比,如将1994年外文出版社出版的 *David Copperfield* 与1908年林译《块肉余生述》对照。(刘宏照,2011:297)我们不禁要问,林纾和董秋斯用的是同一个底本吗?林纾及其合作者1908年翻译时会使用外文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 *David Copperfield* 吗?像这样不考虑史料的适用性、随意比较的情况,在林译研究中还很常见。建立在这种史料比勘基础上的研究显然令人生

疑。历史研究强调尽可能使用第一手文献,但我国21世纪以来出版的好几部林译研究博士论文,使用的竟然都是1981年商务印书馆重印的10部林译名著。这些新版译著的副文本,如文字体系、排版方式、封面设计、书末广告、插图信息等,与清末民初版本存在明显差异。重印本有时还会出现错别字,如商务印书馆1981版《不如归》有一处林纾按语为“欲著《甲午海军戴盆》”(林纾,魏易,1981:80),其中的“戴盆”很费解。经笔者比勘,发现“戴盆”实为“覆盆”之误。因此,要考察林译,应尽量使用清末民初版本,最好是初版本。

樽本照雄提出的底本问题,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他严格依据底本对译文做出评价的做法,应成为我们今后进行翻译文本对照的基本要求。在研究清末民初的翻译文本时,尤其要有版本意识和底本意识,要意识到“原作”可能有不同的版本或改写本,文本对照时要尽可能找到译者当时使用的“源作”(即“底本”)。以前我们的底本意识不够强,与我们对翻译活动的动态性、社会性认识不足有一定关系。我们要认识到“原文-译文”对照法是存在问题的。“原文-译文”对照法只关注翻译活动的一头一尾(即原作和译作),忽视了原作物质形态的衍变和译本的制作、传播过程。事实上,从原作的物质赋形到译本选择、文字翻译、译本制作、译本传播和读者阅读,每一个环节都有许多行为主体参与其中。有学者指出,翻译史研究不仅要关注译本(products),还要关注翻译的生产和消费过程(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Rizzi, Lang & Pym, 2019:2)关注译本的产生、传播和接受过程,这也是翻译研究社会转向(the social turn)应有的内涵。樽本照雄关注的是翻译活动的起点,他充分注意到原作物质形态的动态衍变性。图里也注意到翻译源文的复杂性。他在谈到描述翻译学的关系假设(the Relationship Postulate)时指出,要考察目标文本和源文本的关系,首先必须确定源文(one would first have to determine what the source text might have been)。(Touy, 2012:99)他认为有四种情况会令源文的确定十分棘手:1)在同一源语文化和语言中,假定的源文(assumed source texts)可能存在不止一个版本;2)有好几种语言的文本可充当源文本,译者可能只使用了其中某一种语言的文本作为翻译的源文,或者使用一个纂辑而成的混合文本(a compilative source text)作为源文本;3)自译(self-translations)的情况;4)间接翻译(mediating translations)的情况,即

译者使用某一译本作为翻译的源文。(Toury, 2012: 99-102)樽本照雄的个案研究与图里的理论概括共同强调了一个问题,即翻译史研究要高度重视底本的复杂性,要注意对底本进行甄别。令人欣喜的是,底本问题已开始引起我国一些学者的注意。如有学者通过研究严复手批《国富论》的英文底本推翻了许多研究结论。(刘瑾玉,2015:33-39;刘瑾玉,2018:142-149)近年来,国内外还有一些学者开始研究翻译手稿(Munday,2013:125-139;张汨,文军,2016:120-128;张汨,2018:75-78),其中一个原因也是认识到翻译活动的动态性和“原文-译文”对照法存在的问题。

还应当注意的是,在解释译本偏离源文的现象时,也要注意防止静态思维和简单化处理。要认识到从译者完成文字转换把译稿交给出版机构,到译本最终出版发行,译者、出版机构、译审、编辑等行为主体往往会参与译本最终面貌的形塑。因此,最终送到读者手中的译本,并不单是译者翻译行为的文本化结晶,而是多个行为主体合作与妥协的结果。如果某个译本偏离源作,有些是译者的操作,有些则可能是其他行为主体干预的结果。葛浩文在谈到自己的翻译经历时就讲,西方的出版商和编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删、改译文,他翻译的许多中国作品,都因为出版商、编辑的建议或要求被迫做了较大幅度的删改。(李文静,2012:59)出版家沈昌文(2011:55-56)回忆他负责出版的翻译书籍《情爱论》和《第三次浪潮》时透露,当时他作为出版人因害怕书内的某些内容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就直接出手对译文进行了删节。葛浩文和沈昌文的经历告诉我们,拿着译本讨论译者如何删改或操纵源作,把译本的变形或偏离全部视为译者的翻译行为,也存在很大问题。

樽本照雄的研究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就是翻译史研究者要始终对那些广为接受的观点保持高度的怀疑。樽本照雄在研究中常常以研究长编的形式,不厌其烦地梳理一代代林译研究者因袭、犯错的过程,充分暴露了林译研究中长期存在的盲从权威、批判不足的问题。笔者在阅读他的这些文章时,一直在思考两个问题:为什么他能够发现我们长期以来忽视的林译底本问题?他是怎么发现这个问题的?樽本照雄没有明确阐述,我们需要从他发现底本的过程中去寻找答案和启示。

论文集最后一篇文章“最近的林译小说评价——某种不安的新趋势”讨论的是林译小说评价的结构

或框架。樽本照雄(2018:430-434)在文中质疑了郭延礼提出的两个观点:一是“以译文为中心”的翻译研究观,一是“翻译就是再创造”的翻译认知观。樽本照雄担心这两个观点可能会导致研究者只以译作为中心,不再讨论译作与源作的关系。在他看来,不讨论译作与源作的关系,根本算不上翻译研究。(樽本照雄,2018:435)这一观点似乎有些老套,但对于清末民初翻译的研究来说可谓对症下药。樽本照雄没有提及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其实郭延礼的两个观点与图里倡导的描述翻译学思想颇为相近。因此,樽本照雄对郭延礼翻译观点的质疑,亦可视作对以目的语为中心的(target-oriented)翻译研究模式的质疑和反思。以目的语为中心的研究模式是当代翻译研究的一大突破,但运用不当很容易忽视或弱化译本与源作的关系,对清末民初翻译的研究来说尤其如此。这一时期的许多译本没有准确标注底本信息,有的译本甚至到现在还没有查到对应的题名。因此,要研究清末民初译本与源作的关系,常常面临很大困难。以目的语为中心考察翻译的可接受性,可以只研究译本与目的语文化的关系,而不必关注源文(Toury, 2012: 99),这为绕开困难重重的源文-译文对照提供了理据,开拓了清末民初翻译研究的广阔空间。但这样一来,追查翻译底本就变得可有可无了,这正是樽本照雄所担心的“不安的新趋势”。他反对“翻译就是再创造”的观点,主要是因为清末民初的翻译通常被认为是“再创造”的、以意译为主的,结果就容易打消我们考察译作偏离源文真相的念头。他的这些看法与他所秉持的底本思想是暗合的,因为如果不重视译本和源作的关系,也就不必再去费力追查翻译底本了。笔者认为,樽本照雄之所以能够突破前人研究,很大原因就在于他并不轻易附和任何权威或翻译理论。他并不认为清末民初的译本就是译者的随意再创造,这是促使他锲而不舍追查底本的观念动力。换言之,对源文-译文这个连续统内文本关联的坚守,是樽本照雄不放弃底本追查的重要原因。樽本照雄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描述翻译学研究思想的一种纠偏。

樽本照雄对林译《凯彻遗事》的研究,很能反映他敏锐的洞察力和强烈的批判意识。他研究的起点并没有特别之处,不过是拿林译《凯彻遗事》的开头一段与莎士比亚的戏剧原文进行比较。他发现林译开头提到了罗马立国450年,但在他用以比勘的莎士比亚原文中根本找不到这一信息。这种信息出入在清末民初的译本中很常见,但樽本照雄并没有想

当然地认为这就是译者的随意增添或“再创造”。他敏锐地意识到其中的问题：“莎士比亚原作的开头中哪里写着罗马建国450年了？林译对历史背景做了说明，难道是他自己经过调查的创作么？林译的表现不含[合]常情”（樽本照雄，2018:264）。他随后产生的疑问直接催生了他的底本意识：那些声称林译将戏剧改成小说的人有没有将英文与林译进行过对照？林译《凯彻遗事》会不会像林译《吟边燕语》那样，翻译时使用的是一个已经改变为散文的文本？于是他就去搜集莎士比亚原作的各种版本，最后确定林译历史剧的底本是奎勒·库奇的小说版图书，一举推翻了林译将莎士比亚戏剧小说化的说法。从这个例子看，激发樽本照雄去追查底本的灵感就来自他对文本事实的尊重、敏锐的质疑思维和强烈的学术批判意识。

#### 4. 结语

皮姆(2007:5-6)认为，翻译史至少应包括翻译考古、历史批评和解释三个领域。底本考辨正是属于翻译考古的一种“复杂侦探工作”(complex detective work)，是历史批评和解释的基础。林译小说到底有没有随意更改源文体裁？有没有大幅删改原文？这些问题应通过扎实的史料比勘才能得出站得住脚的结论。樽本照雄的根本性突破在于他有强烈的底本意识。在该意识的驱使下，他锲而不舍地去追查林译底本，并通过追查来的底本与林译对照，重新认识和评价了部分林译作品。他并没有完全否定林译有偏离底本的情形，但他的研究表明，我们以前对林译缺陷的认识很不可靠。他在这本文集中讨论的底本虽然数量有限，但足以让我们怀疑百年林译研究的结论，甚至是清末民初翻译的研究结论是否可信？隐含在他研究背后的观念、方法和批判精神，对我国当前的翻译史研究无疑具有重要启示。尽管他的有些观点（如对郑振铎的评价）还有讨论的空间，但从他所发掘的底本的价值、倡导的底本意识以及揭示的林译研究中的深层问题这些方面看，《事件簿》堪称林译研究的一个界碑，应该成为我们重估林译乃至清末民初翻译的一个新起点。

#### 注释：

①受樽本照雄底本思想启发，本文在行文时有意识区分了“原文”（或“原作”）与“源文”（或“源作”）（引用文字除外）。“原文”指原作者以创作语言出版的、完整的初版本，对应的英文为 the original text。“源文”指译者翻译时使用的文本，与“底本”概念重合，对应的英文为 the source text 或 the immediate source text。英文 the source text 直译当为“提

供信息来源的文本”，实际上就是“底本”，但国内一般通译为“原文”，现在看来不够准确。有些研究使用的“原文”实际上是“伪源文”。

#### 参考文献：

- [1] Munday, Jeremy. The role of archival and manuscript research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translator decision-making [J]. *Target*, 2013, 25(1): 125-139.
- [2] Pym, Anthony.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
- [3] Rizzi, Andrea., Lang, Birgit. & Pym, Anthony. *What Is Translation History? A Trust-Based Approach* [M]. London: Palgrave, 2019.
- [4] Toury, Gideon.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revised edition) [M].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12.
- [5] 韩洪举. 林译小说研究——兼论林纾自撰小说与传奇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 [6] 李文静. 中国文学英译的合作、协商与文化传播——汉英翻译家葛浩文与林丽君访谈录 [J]. 中国翻译, 2012 (1): 57-60.
- [7] 林纾, 魏易 译. 不如归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 [8] 刘宏照. 林译小说翻译研究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 [9] 刘瑾玉. 严复手批《国富论》英文底本研究 [J]. 中国翻译, 2015 (5): 33-39.
- [10] 刘瑾玉. 译者严氏之言说，还是编者罗氏之言说？——严复译《国富论》案语来源甄别研究 [J].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2018 秋季号), 2018: 142-149.
- [11] 陆建德. 文化交流中“二三流者”的非凡意义——略说林纾翻译小说中的通俗作品 [J]. 社会科学战线, 2016(6): 135-142.
- [12] 沈昌文. 八十溯往 [M].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1.
- [13] 王尔敏. 史学方法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8.
- [14] 王建开. 翻译史研究的史料拓展: 意义与方法 [J]. 上海翻译, 2007(2): 56-60.
- [15] 王瑞来. 古籍校勘方法论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 [16] 王祖华. 也谈陆建德论林译“二三流”作品的非凡意义 [J]. 东方翻译, 2019(5): 23-28.
- [17] 谢天振. 陆建德论林译“二三流”作品的非凡意义 [J]. 东方翻译, 2018(6): 4-7.
- [18] 张汨. 注重翻译手稿 推动译家研究——Jeremy Munday 教授访谈录 [J]. 上海翻译, 2018(2): 75-78.
- [19] 张汨, 文军. 朱生豪翻译手稿描写性研究——以《仲夏夜之梦》为例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6(3): 120-128.
- [20] 樽本照雄. 林纾冤案事件簿 [C]. 李艳丽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